

# 中共早期党人对辛亥革命认识述论

凌兴珍

(四川师范大学 社科学报编辑部, 成都 610068)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从思想史角度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而且有助于厘清目前我党主流的辛亥革命观点的思想源流。中共早期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五四至大革命失败初期的逐步深化过程,主要涉及辛亥革命的发生背景、革命性质、历史地位、失败原因以及孙中山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的认识,这些认识内容及其变化,对中共早期党史乃至大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我党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认知基石。

**关键词:**早期中共党人;辛亥革命;认识;双十节纪念;孙中山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3-0142-11

辛亥革命是改变近代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相距不到十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其早期党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他们在五四至大革命失败初期的中共建党早期,对辛亥革命的成败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深刻反思,主要涉及辛亥革命的爆发背景、革命性质、历史意义和失败原因以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的认识与评价,并力图为当时的革命实践提供策略指导,从而对中共党史乃至近代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学界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党派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诠释的研究仅有部分成果发表,专门从思想史角度梳理中共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的论著尚不多见<sup>①</sup>,这极不利于人们全面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以及当前我党流行的辛亥革命观点的思想源流。本文拟就五四至大革命失败之初的中共建党早期,中共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变化过程做一述论,力图为我们了解当前我党主流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认识的起源提供线索。

五四时期,随马克思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与社会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毛泽东、瞿秋白、陈独秀等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运用新思想、新理论来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和缺陷,进而指出革命党应做政制建设与宣传普及的补习功课,由共和而社会主义乃是社会进化的规律。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已初步认识到辛亥革命并非大众的联合斗争,但却造成了政治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局面的事实。他说:“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这些“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sup>[1]389-392</sup>。

1919—1921年初,瞿秋白认识到辛亥革命是破旧立新,但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1919年11月21日,瞿秋白认为:“从前中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新政,庚子以后的新政,辛亥革命,几次几番的再造共和——都不是真正的革新,因为总带着‘君子小人’主义的色彩。”<sup>[2]25</sup> 1921年1

收稿日期:2011-10-08

作者简介:凌兴珍(1965—),女,重庆渝北人,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审,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教育史。

月,瞿秋白又指出,“一九一二年的革命运动”是“破旧立新”、“宣告成立了共和国”,但“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sup>[3]167,174</sup>。

1920年,陈独秀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政、建立了民国,但人们的帝制思想并未消减,共和民主的政制建设与宣传普及还要做苦功补习。1月3日,陈独秀说,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以至“我们现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制底下的自由民”,因此他建议,“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自孙中山先生起的中国革命党应该“赶快恢复到辛亥以前的生活。一面宣传民治主义普及人民,一面设法取消帝政”,“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有三门:(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sup>[4]75-76</sup>。10月1日,陈独秀认识到,辛亥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这一值得纪念的历史空前盛举,只是一时偶发、“太没有持续性”,原因在于“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至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继而指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因而认为民国共和政治并无特别价值<sup>[5]179-181</sup>。

##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到1925年初,基于对中国国情和革命任务的认识与分析,中共中央执委会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历史地位及未成功原因有过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并确立了“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中国革命任务以及“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革命方略,以指导现实革命斗争;中共早期党人蔡和森、瞿秋白、陈独秀、张太雷、彭述之等也对辛亥革命的成因与性质、失败原因与教训进行了深入思考。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十九世纪后半期闭关自大的中国受到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强迫的侵入后,经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经济力强迫而痛苦,一方面

发现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在封建政治下的改良运动便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毕竟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自强运动里面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所以辛亥革命战争,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不幸这种战争在中国“至今尚未能成功”,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由于民主政治未能成功,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方法就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sup>[6]16-23[7]33-46</sup>。这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最早论述到辛亥革命发生原因、历史地位与失败原因的一篇文章,为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之决议奠定了基础。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急迫要求之举”,决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sup>[8]65-66</sup>。

针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与北洋军阀谋政治统一、支持联省自治的做法,1922—1923年间,蔡和森用辛亥革命及其后革命屡次失败的教训为例证给予有力驳斥,指出中国革命性质已由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变成国民革命,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即与民众结合、与苏俄结盟,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直到完全解决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为止。1922年8月,他指出:“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这一点做不到,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辛亥革命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革命党误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以至全政权完全落于北洋军阀之手”<sup>[9]62</sup>。9月13日,他又

指出：“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即“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因此，“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国民党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sup>[10]95,98,100</sup>。9月20日，他再次指出：“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由此就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故“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sup>[11]70-74</sup>。1923年5月2日，蔡和森进一步指出了中国革命性质已由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变成国民革命运动：“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实际上与十八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有国际地位及经济地位之不同”，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sup>[12]87-188</sup>。

1923—1925年间，瞿秋白撰文直言辛亥革命的民族革命性质以及在思想、教育、斗争方法、反帝方面的局限性。他一方面认为辛亥革命为民族主义革命。他在1923年6月2日指出：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但“当时此种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本不能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sup>[13]93-94</sup>；1925年2月又指出：“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sup>[14]77</sup>。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辛亥革命有多方面局限性。他在1923年5月指出：辛亥革命挂出民国招牌，“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sup>[15]7</sup>；6月2日指出：辛亥革命时，“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满清的动机，发于间接的恨帝国主义者多，而起于要求民权者少”<sup>[16]93-94</sup>；8月15日说：民国号称“共和政体，五族协作”，但“满人说汉族欺侮他们，蒙人说只是一族共和”，实际上“向来是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及他们反对党的独和而已，真正的平民没有丝毫自由及权利”<sup>[17]93</sup>；11月15日又说：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还是国民党，然而

“人民往往只见国民党主战，以为是扰乱”，“国民党的斗争方法或者一时因为人民不与援助，逼得不能不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sup>[18]287-288</sup>。1925年4月，他又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里的革命潮流，因袁世凯的反动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几乎一般社会都认革命是作乱，国民党是乱党”，“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往往只是军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或者是限于士绅阶级的排外的爱国运动，没有群众的反抗，直接要求废除对外条约，收回外国攘夺的领土”，辛亥革命并未突破“义和团失败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这种局面直到五四运动才被“打破”<sup>[19]155-156,157</sup>。

1923—1924年间，中共中央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运用历史唯物观透彻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成因与性质、失败原因以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变动趋势，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他先从“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两方面论证了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后又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3年4月25日，他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首先从辛亥革命发生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论及辛亥革命的性质，认为：自明代西力东渐、清代鸦片战争、甲午庚子两次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已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反映，“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化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接着，从辛亥革命表面成功而实质失败的原因论及辛亥革命的性质，认为：“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最后得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的结论<sup>[20]580-582[21]446-449</sup>。在“民主革命”口号为“国民革命”口号取代之际，陈独秀又将辛亥革命看作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农民看作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无产阶级看作国民革命成功及民族解放达成的主力军和督战者。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将辛亥革命运动视为甲午战败后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至“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近三十年国民革命运动的第二期，

并对革命队伍渐次扩大乃至革命成功充满信心,认为幼稚的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sup>[22]594,598[23]558-559,562-563</sup>。1924年12月20日,陈独秀发表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再次指出“‘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但是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最后得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不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sup>[24]820</sup>。

陈独秀视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看法,得到了彭述之的认同,但张太雷对辛亥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价值却评价不高。1924年10月8日,彭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一文,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革命所代表的意识确是资产阶级的”,“其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绝不像一般人所说,仅仅由于满洲政府之昏庸暴虐和其贪官污吏的暴敛横征及汉人仇恨满族所致,而实在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猛烈侵掠之结果”,“当时革命的口号所谓排满,就是说满洲政府对外怎样软弱无能,对内怎样横征苛敛,其实满洲政府之所以软弱无能,在客观上看来,并不是满洲政府的本身错过,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不能专拿排满观念作辛亥革命的根本原因”,“在辛亥革命起事之前日,有几件重要事即引起辛亥革命爆发之近因”,一是铁路商办问题、二是收回矿权与矿山商办问题、三是各处乡民反抗官吏苛敛事件、四是水灾事件,都是“帝国主义的侵掠所酿成”或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掠”,“总之,有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掠在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因而根本崩坏;由此在各方面发生各种病象,辛亥革命就是各种病象汇合起来之最后的表现。所以我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猛烈侵掠的自然结果。反转来说,辛亥革命的原因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侵掠”,因此“辛亥革命虽然是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阶级性质不十分明显,然在实际上当时革命所代表的意识确是资产阶级的”<sup>[25]187-190</sup>。张太雷于1924年10月8日发表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一文,却根据辛亥革命

“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进攻而反示好于帝国主义”的情况,认为它是“一种纯粹的对内的民治主义的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sup>[26]77-79</sup>。

上述中共中央执委会、蔡和森、瞿秋白、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关于辛亥革命发生原因、革命性质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定位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陈独秀还专门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的三个重大错误,沉痛而深刻地检讨了辛亥革命失败以及继续辛亥的革命仍然是失败的原因。10月8日,第十三个双十节即将到来之际,陈独秀发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指出:“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此处所称中国国民党,乃包括自同盟会一直到现在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何以如此,根本上自然有当时社会的经济原因;而专就革命党人努力及其政策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三个重大的错误,也是失败之原因。”第一是误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党中“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满清虐政之直觉,以为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大多数”,“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这一专事感情的排满运动却忽略了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对外收回权利(矿山、铁路等)、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所以“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在当时民众心理上竟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因此清室一退位,革命党便失了革命运动的机能,使帝国主义者安然以巨款援助袁世凯解散革命的势力。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自始即失之过早,辛亥革命也因此而早熟而失败”,“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社会的基础之原因”;至于党的训练,即便是左派首领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等,在革命前“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在兵事起后亦“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只专力军事行动而不注意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即现在的国民党仍然不曾抛弃这种旧观念”;由此陈独秀得出一个重大教训:“革命自然应有军事行动,然而在没有相当的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以前,即贸然做军事行动,且专力于军事行动,即令军事上占得胜利,也断然没有成就革命事业的可能。没有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及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国民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其原因乃由于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首领孙中山等,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

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等,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自从清室退位,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遂渐渐表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即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妥协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和政府北迁,第三步妥协是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筹商国是,第四步妥协是解散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妥协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袁派阁员临时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内阁,“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这些妥协的责任,“大部分固应归之右派,而左派诸领袖,为什么也尽量容纳右派的主张,与之合作也是一个问题”<sup>[27]790-794</sup>。12月20日,陈独秀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再次指出辛亥革命因单调的排满与单调的军事行动两个重要方法错误给辛亥革命及辛亥后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他说:“(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国民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sup>[24]815-816</sup>

陈独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的分析相当深刻,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1924年10月8日发表的《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一文的分析略有不同。彭述之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纯粹的客观的抽象说明,自然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遂成了流产。然而具体说来,却不这样简单,我以为当时代表辛亥革命的主人翁——国民党,应负相当的责任。”他认为国民党最重要的失责点在于:“(一)国民党没有认清真正的群众在那里;(二)没认识他真正的敌人;(三)没了解革命的步骤,——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武装暴动。”他进而分析道:“在那时国民党的群众是商业资产阶级、农民、知识阶级、手工业者、很少数的工人、

小商人等;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变成之土匪,固然可以利用,但绝不是基础群众,真正的基础群众是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民、手工业者。国民党对此仅看见商业资产阶级中之一部分华侨,而忘了最大多数的国内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民、手工业者,只专心致力于会匪和军队运动。所以结果就成了土匪军队的‘革命’,所以当时国民党对于商业资产阶级之铁路商办、矿山商办,和农民群众的反抗加捐等伟大的运动,绝少参加。所以革命时及革命后,这些群众都懂得不得国民党为谁的利益奋斗,他们都不愿意与国民党发生关系。国民党的敌人很明显的是国际帝国主义与满洲政府的封建阶级,然而国民党把前者完全看掉了,对于满洲政府的封建阶级,也只看见满族,没有看见整个的封建阶级。所以革命的口号,仅一个空空洞洞消灭满族,没有使群众明白革命真正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结果是推倒了满族而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袁世凯,还依然存在,酿成现时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互相勾结所闹出来之不可了结的大祸。不懂得革命步骤、即革命政策,所以国民党面前都是几个土匪头子——军阀,滚来滚去。现在还是一样。辛亥革命是中国国民革命第一次试验的大失败,现在看来是那时群众的幼稚尤其是代表群众的国民党的幼稚。”<sup>[25]190-191</sup>

对于彭述之的认识(甚至陈独秀的认识),1927年2月,瞿秋白进行了全面批驳,认为彭述之仅解释了辛亥革命的现象,却“不能以一贯之追求正象的因果”,“于是把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混了,把反革命法西斯式的土匪和失地农民式的‘土匪军队’相混了,对于他唯一的出路,就只有自己头脑里想出书生主义式的死公式来‘教’人家革命;因此,步步实际政策都极容易错误”<sup>[28]477</sup>;认为彭述之“书生式的革命观——‘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像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sup>[29]538</sup>。

早期中共领导人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检讨,是存在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与争论的。而这些观点又深刻影响到中共建党初期对革命宗旨、统一战线、军事活动、民众动员等的看法和政策,并造成中共建党初期对贯彻革命宗旨口号提出、民众动员和党的训练的重视以及对建立自己的武装、争取军队控制权的忽视,从而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的形成与国共分裂之初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及辛亥以后的革命总是失败的原因以及中国国情和革命任务的认识,经过宣传,渐为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接受,从而为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达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通过了《国民党政纲》,同时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加强了纪律,并愿意联合“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党一人的私利的一切人”<sup>[30]216-220</sup>。1924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文件,同意中国共产

党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工作<sup>[31]222</sup>。自此国共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的大革命格局得以形成。

### 三

到1926年10月第十五个双十节,武汉已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下,国民政府的势力已向全国发展,与辛亥武昌起义后全国风从的情形完全相同,国民党面临着即将执掌权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细察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为前车之鉴,反击资产阶级右倾言论,指导并督促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完成辛亥未竟之反帝反封建任务,就显得十分迫切。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讨论又热烈起来,其认识也比以前有所深化、有所发展。

1926年10月10日,张太雷在其主编的《人民周报》发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结合北伐胜利形势,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国民革命运动之开始,它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可惜,辛亥革命只做了这运动的开始而没有完成这运动,它的未完使命尚遗留到现时。我们现在的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成功?为什么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在建立近代的民主国家,而其结果反产生了军阀的专制?个个革命党人及一般民众一定要明白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而且从没有今天这样我们感觉到这样的需要,及容易从目前事实上得这些原因的。”根据他的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缺乏基础及领导能力、没有正确的对外对内政策、没有真正革命军队、没有省及地方的基础,要求国民党对此高度警觉并切实加以解决。(一)党没有基础与领导能力。他说:“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时没有一个有领导势力的党。当时的党没有命令自己军队进攻与退守的权力,党的命令不能行之于全党,党员大半是自由行动,以致于党的政策不能一致,革命运动的内部完全在纷乱状态中。”为什么当时的党没有指挥革命的能力?“党在当时没有党军可以强逼执行党的命令之原因,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部不团结及党没有民众的基础”,“党内部不团结由于党内没有一致的对外对内政策”,“党没有民众的基础,亦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对外对内政策”,“党没有一个正确党纲,拥护民众的利益而能使民众起来拥护的政纲,因此党的行动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他进而指出:国民党现已在民众中间有了一部分基础,但是这部分的基础是不够、尚未稳固的,“要扩大民众基础,必须规定一具体而能实现的最小限度的政纲,以为号召民众拥护国民党及参加革命之中心”。(二)没有正确的对外政策。这表现在“辛亥革命一开始,就宣言承认列强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错误的对外政策,使革

命丧失了真正的意义,使人民对革命的目的不能认清”,“当辛亥革命的政府宣言承认各国条约时,辛亥革命就宣告破产了”;他进而指出:“国民政府如要继续为革命的政府,得人民的拥护,必须坚持其反帝国主义的政策”,并且“不让任何形式的欺骗而改变这政策”。(三)没有正确的对内政策。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或提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唯一的口号就是排满,至于中山先生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完全被蔽匿而未提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人民生活的政纲,因此人民对于这革命不能起兴趣,于是辛亥革命就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失败了”;对于当前的大革命运动来说,“如果现在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是说如果农民不得到解放,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四)没有真正革命军队。他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完全乌合之众,都是些随声附和的土匪及旧式军队”,“党在那时没有中心的革命军对外可以抵御敌军,对内可以强制执行党的命令”,“党没有可靠的军队,亦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原因”,所以我们要记住,“要使军队能听党的命令,党一定要有权力,要使军队服从人民的议决,人民一定要有伟大的有组织的努力”。(五)没有省及地方的基础。他说:“辛亥革命是上层的军事行动,用武力完成的政变,并没有掀动乡村与各县的基础,在无论那一省革命党没有一点基础”,“假使辛亥革命在乡村或省县有一点基础,一定可以保存固有地盘,或至少不致失败的如此快法”;他进而指出:“我们应当回想辛亥革命因没有省县及乡村的基础而失败的教训,来提起我们对于省县及乡村问题的注意”,“目前革命党的注意不应完全在国民政府的衙门或总司令部或中央党部,而要更多注意于省政府,县政府,乡村行政,省党部,县党部,区分部。现在应该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向下运动。现在革命党人的工作应该不容缓的朝实际方面去了。让大家把革命的墙脚弄稳固起来”<sup>[32]279-286</sup>。张太雷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不仅比陈独秀、彭述之的总结有所深化,而且增添了新的思想及时代内容,是相当深刻而有现实针对性的。

针对收回利权的稳健温和论调,中共中央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胜利的角度重申了国民革命的任务与方法。1927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一切帝国主义者无条件完全放弃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统治权力,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雇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这个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的,只有不断的争斗与牺牲可以得到”,“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现在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去试探了”<sup>[33]16</sup>。

针对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这十四年“畸形混沌”的中国式革命,彭述之认为,这十四年的中国“并无革命”和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假革命”,原因是“畸形混沌的中国”导致“畸形混沌的革命”和“畸形混沌的革命政策”的观点,1927年2月,瞿秋白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一文予以批驳,并提出了“中国确有革命,不过是一种特殊的‘非欧洲式的’革命”的观点,认为“要解释这种‘畸形混沌’的中国式革命,必须再略略说明中国的经济现状,各阶级的力量及其国际关系”。通过对中国的经济及社会阶级的分析,瞿秋白指出,“辛亥革命时,反对官僚买办阶级(盛宣怀、袁世凯)的有许多不同的阶级:一、商业化的地主土豪劣绅(各地方的绅士)及小资产阶级;二、商业资产阶级(华侨);三、游民无产阶级及工匠工人;四、小农阶级。辛亥革命既然失败,从二次革命直到冯玉祥倒戈,这些阶级一方面分化变迁,别方面时时改变其集合之形式,而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之国内战争”,“中国革命是在进行着,表面上看是‘土匪头儿’的混战,实际上实含有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的意味”,“辛亥革命后十六年来的历史事实是如此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最初因为是小农国家的缘故,的确是先有武装暴动,而后有宣传(辛亥时的新闻政策),最后再有组织(军队),恰好与彭述之所谓‘科学的革命方法’相反”。瞿秋白进而分析了辛亥革命的阶级性,“中国辛亥革命的时期,治者阶级是满清贵族及官僚买办阶级,受治阶级是农民、工匠、商人、商业资产阶级。此外,还有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的商业化的地主土豪阶级(地方上的绅士:咨议局、商会等)……。至于游民无产阶级,确实些说,就是失地的农民,他们开始都在革命方面,然而革命爆发之后,很迅速地崩散,不但反动的官僚买办阶级收买他们,残杀他们,甚至于商业资产阶级也帮着镇压他们。辛亥革命之中,华侨的商业资产阶级——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确是主要的推动力,他们差不多在革命之中处于领袖地位……。这一民族的商业资产阶级,经过袁世凯的賂买,经过与地主土豪阶级的妥协(宋教仁容纳章炳麟及张謇派之国民党组织)始终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不久,这一阶级在经济上也分化了。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是商业资产阶级想领导一般‘平民’,革官僚买办阶级的命;但是这一阶级不但在政治上失败,并且在经济上消失其为革命阶级的资格,于是中国革命渐渐失去他的中心”<sup>[28]435-436,478,459-461</sup>。

针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过火的论调,1927年2月,瞿秋白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的观点<sup>[28]512-513</sup>。这与陈独秀将占中国全人口多数之农民视为“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的认识有相似之处,更被毛泽东用“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句更富激情的话语表述了出来。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给予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认为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sup>[34]1-16</sup>。

## 四

随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胜利与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发展,国民党右派渐渐向豪绅资产阶级新式军阀的政党转变,并与共产党决裂,导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或双十节的纪念又有了新的内容,举出了中国共产党完成辛亥革命事业的大旗,并非如学人所认为的那样,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战爆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前,“共产党对‘双十节’没有发表观点”、没有“对辛亥革命的纪念”<sup>②</sup>,只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统治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偏低而已。

1927年10月10日第十六个双十节,中共中央在《前锋周刊》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正式祭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的大旗。文章指出:现在的所谓国民党“完全又是军阀官僚的党”,他们“不要民众的胜利”,他们从四月到八月“开始屠杀压迫民众及共产党,把工农民众反抗豪绅资产阶级贪官污吏新旧军阀的革命行动,都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国民党既然与共产党分裂,既然自绝于工农民众,既然自绝于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既然背叛革命”,“辛亥革命的事业岂能希望他们来继续”;所以今年双十节纪念的意义就在于指示民众:“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要开辟新的道路”,“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据此,中国共产党指示工农贫民兵士的群众应当起来反对国民党诸军阀之间的战争,应当自己拿起枪来打倒这些新旧军阀,“要这样才能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sup>[35]378-385</sup>。这是笔者见到的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的最早表述。

针对国民党利用双十节纪念之机所进行的欺骗宣传——辛亥革命事业已由他们完成,中国统一业已成功,豪绅资产阶级专政之必要(所谓训政时期开始),现在的任务是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黄色改良主义等,192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在《布尔塞维克》发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配纪念辛亥革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

建地主阶级借着国民党做工具,更残酷的统治现在的中国,所以辛亥革命的客观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建立真正独立统一自由的平民式的民主共和国等——一个也没有完成。所以客观上的辛亥革命运动,仍要继续向前发展,……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农”,往后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以前的区别“就在于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地主之外还要加上反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他进而指出,“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的高贵口号,可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直到现在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所以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运动。这一任务的最后完成只有推翻现在资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所以往后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便是要建立工农兵以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最后他提出十大政纲作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政府的主要口号,也就是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sup>[36]776-782</sup>。这里,蔡和森明确表述了辛亥革命由工农完成的观点,并提出了十大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完成辛亥革命的主要口号和大旗。这是笔者见到的中国共产党人举出完成辛亥革命大旗的第二份文献。

1930年9月30日,在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发表《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讲话,再次指出自同盟会以来的国民党两次出卖辛亥革命的事实,进而自豪地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区域里,“辛亥革命的任务已经真正完成”,“只有苏维埃能够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苏维埃区域的劳动群众和红军正用勇猛拼死的斗争来纪念辛亥革命。他说:“今年纪念辛亥革命,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已经有许多区域里面早就成立了工农兵民众自己的政权——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才是真正革命的政权。这些区域里面,辛亥革命的任务不但已经真正完成,而且更加彻底的进行着革命的斗争。辛亥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打倒一切封建势力,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是建立真正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然而,当时领导革命的国民党出卖了革命,革命的任务没有实行,没有完成。……现在,国民党还有脸皮‘庆祝’辛亥革命!现在国民党早已经是反革命,早已是地主资本家压迫工农的政府,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政府还叫着中华民国的政府,还庆祝辛亥革命的‘国庆’!……这次汪精卫、邓演达、陈独秀等等,是要破坏工农的革命,是要欺压工农民众——主张国民会议可以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只有苏维埃能够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苏维埃是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是真正彻底的民权,就是要禁止地主资本家参与政治。苏维埃的革命,不但能够真正彻底完成辛亥革命的任务,而且他的胜利,还要开辟中国的真正社会

主义发展的道路。……我们要这样完成辛亥革命,要这样解放中国,要这样解放我们自己,就一定要进行坚决的群众的斗争。湖南、湖北、广东、江西……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和红军,正在勇猛的拼死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劳动群众的纪念辛亥革命!”<sup>[37]63-66</sup>

## 五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建党早期,尤其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和国共分裂后,瞿秋白、恽代英、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等人相继发表演讲和纪念文章,对孙中山的革命功绩与理论缺陷有了初步的认识与评价。

1925年2月孙中山患病住院期间,瞿秋白发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分析了孙中山成长的历史背景、政治使命、革命策略与让位袁世凯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是屈服于满洲贵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中国;同时,亦就是受英、法、俄、日等资本国家侵略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一天天的增加起来,中国平民的革命运动也一天天的扩大而且深入……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六十年中一步步的进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家——孙中山也就在这过程里逐渐的生长出来”,“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尤其是民族革命的中国,而孙中山的历史使命,便是完成这一民族革命”,“孙中山的同盟会,也是以代表‘下等社会’的会党做实力的基础。尤其是当时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要借此组织并集中‘下等社会’的力量于革命的标语”;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让位袁世凯,是因为“辛亥革命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袖革命的阶级,所以失败”<sup>[38]76-90</sup>。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后,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等人相继发表纪念文章,阐释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主义内涵。在3月14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的演讲里,与主义内涵首先谈及时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有的说他的好,有的说他不好;但是我们要注意没有人说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不对的,没有人说中国的内乱是由中山先生的革命造成的。人人都承认中山先生的事业,是引中国四万万人向较好地地方走的,没有说他是引大家向坏地方走的”,进而指出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社会的八点贡献:(一)始终为民族独立奋斗,(二)注重人民生计问题,(三)有建设中国计划,(四)主张造党治国,(六)主张革命政府独裁,(七)联合国内外革命势力,(八)富于不妥协的革命精神<sup>[39]641-647</sup>;在3月21日《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文章中,恽代英再次指出,“人人都知道纪念孙中山先生,人人都知道哀悼孙中山先生;无论是平素反对他的,平素有许多地方不满足于他的,但是到了他死了的时候——他为中国民众的幸福与利益经过四十年的奋斗而死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中国民族的一个重



大损失,大家都崇拜而纪念他”,继而号召全中国青年“即刻决定志向去加入国民党,去参加国民党所倡导的民族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工具”,同时提请人民注意“一个革命党的纪律和防止右倾,是如何重要的事”<sup>[40]648,651</sup>。赵世炎在3月15日发表的《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一文里,首次用“中国民族革命的导师”来评价孙中山先生,并对孙中山主义的内涵进行了阐释,称:“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导师,同时这个革命导师的职务,就构成了他的三四十年的生活”,“把民族独立与自由放在革命目的的第一单位上,始终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便是孙中山主义的第一个成份,而且是最重要的成份”;“中山先生的本身,是一个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实行家”,“中山先生一生的事迹,就是估量革命实际的环境,而成为他的信仰之运用”;“孙中山主义之内容固然包涵三民主义,而且三民主义为中山先生时所自建立之学说,在解释其革命原则与建国主张时,是一般涵义的要点,惟尚不能包括其理论与实际之全部。孙中山主义之最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中山先生所自倡的三民主义及其应用”,“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与独立。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打倒障碍民权之军阀,建设民主的政府。要求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之绝对自由。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最确切的解释起来,就是:根本铲除目前障碍民主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用人民的国家的力量,开发实业,发展农业以厚利民生”<sup>[41]239-241</sup>。瞿秋白3月21日发表的《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一文指出:“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的革命意志、革命主义及理想不过是中国平民革命的代表,“他们不死,‘孙中山’是永不死的”<sup>[42]137,139-140</sup>。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忌日,李大钊、张太雷等人相继发表文章,对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解放历史和国民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给予肯定。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先生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

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sup>[43]848,854</sup>。张太雷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称:“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伟大的领袖”,“是因为他创造了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学,而是中山先生四十年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之堆积”,“中山先生所以能够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因为他一生努力于革命的实际工作,并从他的经验指示我们完成革命的方法。中山先生主义的中心是革命”,“所以我们要学习中山先生的是革命,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教我们的革命的方法”,“他这种方法是他革命的经验所得到与适合于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之方法”,孙中山革命的重要方法有三点: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靠民众的势力,二、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党,三、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与世界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我们以为以上的三种革命方法是中山先生主义的精髓,是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策略”<sup>[44]109-113</sup>。

面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日益反革命的局势,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先后发表文章,阐述孙中山的革命功绩与理论缺陷。1927年11月14日,恽代英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不仅表示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勇敢精进的精神、不懈奋斗的精神要纪念,而且明确指出要打倒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偶像以厉行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中的不肖首领,要攻击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保留的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旧思想与旧理论。他说:“我们亦象国民党的一些人一样,纪念孙中山先生,因为他的革命的精神是永远不朽的”,“虽然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对于三民主义中东方文化、阶级妥协的理论,是要攻击的;对于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偶像以厉行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要打倒的”<sup>[45]1008-1009</sup>。1928年11月1日,蔡和森《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一文也指出:“三民主义曾经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口号,现在完全变成为反辛亥革命的旗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好是代表不彻底的薄弱的狡猾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本性……所以孙中山一开始号召革命,同时即预备了反革命的理论基础。……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与中国共产党及国际无产阶级合作时代,提高了不少革命性,蒋派汪派整个国民党背叛以后,就同着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消失其革命作用而成为反革命的旗帜。现在只有不停的在群众前面撕破这反革命旗帜,才能达到辛亥事业之最后的完成。”<sup>[36]780-781</sup>1929年12月18、28日,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所作的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问题第三讲孙中山主义学说,对孙中山主义学说中的“大资小资”理论也进行了批判,指出:“孙中山的观点

从辛亥以前,兴中会同盟会起,经过辛亥革命,组成国民党,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有许多变更,不是自始至终,一贯到底的,而是有许多变动和不同的地方”,“这些变动,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对于中国根本问题的见解,是有所谓‘大资小资’的基本理论。……他们说,中国没有富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sup>[46]750-752</sup>。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自五四至大革命失败初期这一时期,中共早期党人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表个别现象向深层全面本质拓展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与革命性质、辛亥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及给中

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分析相应较多、较为深刻,基本认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或民主革命性质和辛亥革命是失败了革命的的观点,基本肯定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并重视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探寻,并且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各人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部分论断还带有左倾色彩<sup>①</sup>;他们在中共成立初期把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基础与领导力量放在与各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上,在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土地革命早期才提出了辛亥革命的完成要靠工农、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并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完成辛亥革命的大旗;早期中共党人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总体上比较唯物、客观、全面,较少使用概念化词语,且在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土地革命早期对孙中山主义的理论缺陷有所揭示。

(本文系笔者提交2011年10月四川省博物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成都联合主办的“政治变迁与区域社会——纪念辛亥革命暨保路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交流论文之一部分。在此特向对论文给予过点评指教的邱捷、王东杰、王维江、邵雍等教授表示谢意。)

#### 注释:

- ①对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黄真《月异岁新 与时俱进——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前线》1981年第5期)、宋亚平《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徐万成《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6期)、刘世华《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黄兢《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广东党史》2001年第5期)、毛磊《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间的关系》(《世纪行》2005年增刊)、储天虎《陈独秀论辛亥革命》(《北京日报》2011年2月28日)等论著。专门从中国共产党人及党派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研究角度来探讨辛亥革命的价值与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一卷《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罗福惠、朱英主编,刘伟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四章第270-323页)、严昌洪《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以郭真〈辛亥革命史〉为中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讨论用稿)·四》,中国武昌:2011年10月,第354-367页)以及黄如军、李建安《党和国家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评价》(《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10期)等论著。
- ②学人李英全、周游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受到国民党的围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独占‘双十节’解释权,并将其变成展现‘党国’符号的场域。在此期间,共产党对‘双十节’没有发表观点。直到抗战爆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才又开始了对于辛亥革命的纪念。”(参见罗福惠、朱英主编,刘伟等著《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一卷《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第四章第278页及注释①。)这一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笔者所见资料,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战爆发、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前,中共党人对辛亥革命或双十节至少有三篇纪念文章发表,且增添了新的认识内涵。
- ③严昌洪教授有类似看法,认为:早期共产党人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有复杂的原因;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的认识并不一致;对于辛亥革命历史作用或伟大意义基本是肯定的;对辛亥革命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的认识相当一致;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都很重视;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具有如下几点特色:“一、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帝国主义论、阶级分析方法等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二、有明确的目的,即学术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三、部分论断带有左倾色彩”,“四、缺乏学术规范”。参见严昌洪《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以郭真〈辛亥革命史〉为中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讨论用稿)·四》,中国武昌:2011年10月,第356-367页。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集》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集(1912.6—1920.11)[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 [2]革新的时机到了[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G]//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5]国庆纪念底价值[G]//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6]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G]//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7]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8]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9]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时代[M]//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0]统一,借债,与国民党[M]//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1]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M]//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2]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M]//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3]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4]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5]《新青年》之新宣言[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6]中国资产阶级的的发展[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7]中国之所谓“五族共和”[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8]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9]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20]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1]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22]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3]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24]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25]彭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G]//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6]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M]//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7]辛亥革命与国民党[M]//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28]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雪维克主义[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29]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0]国民党政纲[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1]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2]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3]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5]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6]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M]//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37]辛亥革命纪念和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8]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39]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M]//恽代英文集: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0]孙中山先生[M]//恽代英文集: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1]孙中山主义与其遗命[M]//赵世炎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42]孙中山之死与孙中山之敌[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43]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M]//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4]纪念孙中山先生[M]//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45]纪念孙中山先生[M]//恽代英文集:上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6]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阶级[G]//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李大明]